

# 文学的摆渡人走了

□葛水平

《文艺报》编辑电话告诉我崔道怡老师走了。我停顿了一下，生命真是脆弱不堪一击，树木始终守在四季交替的枯荣中，而站立在树下的那位白发红衣的人不见了。一个素净的人，浑身洋溢着艺术气质，他的谈吐温文儒雅、彬彬有礼，而整个人站在那里的文学形式感又非常强烈，尤其说话时，对写作的青葱和认真，更是极端向上的。

这种感觉首先是属于时间的，认识一个人作为时间的依存物而存在，我的脑海里努力搜寻着与崔道怡老师相识的情景。

想起来是在绍兴，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发地，我和蒋韵姐一起，在一棵树下，他迎着我们走来，目标显著，一下子就吸住了我的目光。同时在崔道怡老师的身后还跟着走来的施战军老师，看上去他们真是喜悦。在互相介绍中谈到了我和蒋韵姐的获奖小说，小个子的我们在大个子面前受到了明媚阳光的温暖，也第一次感觉到了文学前辈把襟底怀中的肯定尽情述说。

认识了便有了后来的邮件往来。同时也因崔道怡老师认识了另一位文学前辈，一脸笑容的张守仁老师。

两位前辈对我的影响是从一篇约写的散文开始的。

崔道怡老师约我为《人民日报》副刊写一篇“征文”，写好发去时，我收到了崔老师的一封信件：

水平：

你好。你应邀为“征文”所写作品，早收见了。当时觉得未如我所料想——我料想你的作品，无疑应该是“头条”的——所以没能即复，要等张守仁先生看后再说。张看后，也不甚满意，认为“皮大馅小”，如果留用，需加压缩。而他是专于散文的，便让我来压缩。这些时，忙于编发早收到的“征文”稿，没来得及加工你这一篇。

现在，发这封信给你，是想征求你的意见，可否同意我们对你的作品进行压缩——《人民日报》强调最好在两千字以内——那么大概需要删掉近千字了。

因而，我有个想法——你可否另写一篇，与“放歌60年”贴得更紧密些，只要两千字，但更有味道与分量。或由衷希望，在此“征文”中，你能有更醒目之作见诸《人民日报》版面。

若你很忙，不愿新写，就请说明，是否同意我们压缩？

等待着你的回复。祝福你一切顺利。

崔道怡 6月3日 10:23

“皮大馅小”，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有力的批评对一个写作的人有多么重要，是一种有力的帮助，尤其对一个文学青年。我后来很少看到这样的文学关怀和文学批评了。对文学的热爱不是文学的态度，是生活的态度，生活给一个作者提供了文学素材，得知道尊重这些素材，而不是自大地情绪化覆盖这些素材。写作的人都是心里比较优越的人，有阅历，对生活有理解，各自持受的宝剑显然是被自己紧握握着，不容质疑，很不愿意听到他人的意见。其实这样下去，文学创作便失去了趣味，失去了生动，更失去了力量。归根结底这句话提醒了我，或者说警示了我。我的创作是有很多缺点和毛病的，如果一味享受迎面而来的夸奖，说“捧杀”二字一定不为过。

张守仁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学的摆渡人——崔道怡》，其中讲到李国文老师的创作经历。一个经受磨难满腹才华的作家，对生活应该是什么以及生命的本质，虽然有自己不清楚但很坚定的见解和方向。可惜，“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古训，虽不承载什么，却可能改变有才华人的命运。文章中引用李国文老师的话说：“编辑的劳动，是一种付出代价、但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正是由于编辑的劳动，才得以保证作家的劳动，不致付诸东流……一部文学史，上面刻满了作家的名字、文学评论家的名字、领导文艺运动

者的名字，唯独没有编辑——为我们摆渡过河的人的名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曾经我和崔道怡老师在往返邮件中谈到创作，他说：你守着太行山就等于占有了文学富矿，只要你获奖后心不浮躁，潜心写作就一定会写出好作品。

少有获奖后不浮躁的人。一个人无论自我感觉有多么棒，但要知道自己的局限和自己环境所处的局限很难，更别说我们在世界内置身的局限。有人会打破，有人会长久受到牵制，写作一旦被名利所牵制，人就会变得奇奇怪怪。对生活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每个人都不乏真知灼见，但一个人不努力、不自我约束、耐受孤独，真是觉得好滑稽。

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

用崔道怡老师的话说，文学编辑的工作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要做到但问耕耘，不计收成，不求闻达。他总结过编辑工作的“五字诀”：看稿要“准”，选稿要“宽”，改稿要“细”，退稿要“慎”，发稿要“严”。

《唐诗三百首》中秦韬玉的《贫女》，以其名句流传千古：“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最后一句在流传中，已经脱离原诗本意，成为一种人生和人品状态的比喻——为他人得意而奉献自己。这状态后来又被引用形容某些行业特色，表现该行业及从业者的素质。自有活版印刷以来，在图书出版和期刊发行系统中，专门从事编辑工作的业者，便时常被著作称赞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崔道怡老师的解释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编辑与作家彼此的辉煌明净。一位素净而清爽的人，相依相对的哲理内涵，真是庆幸曾经做过他的作者。一位活到神仙状态和年龄的学者，做编辑是他一生的工作，也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神仙？全身心入了一种境界就是神仙。

如同张守仁老师问崔道怡老师的话，我也曾经不知深浅地问过崔老师：“我想知道崔老师对小说创作的经验谈，毕竟您是一位优秀的编辑。”

阳光下一头白发、一脸灿烂笑容的崔道怡老师说：“我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多年来阅读和编辑的体会，总结出五个字，即人、情、事、理、味，用以检验小说的质量。人，就是人物；情，就是感情；事，就是故事、情节；理，就是内涵、意蕴、哲理或思想；味，就是味道，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浓缩着密集的美感信息。”

这是对小说写作的高标准要求，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接近？

当我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中时，这些往事因世事变迁而愈加珍贵。对生命脆弱的无穷感叹，于是知道了“生死大限，只是一线之差”，过往的人生悲喜哀乐，如今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人生体验，于是就会发现原来曾经的“沾沾自喜”有多么轻佻，其实都不重要，那不过是一个人的经历，仅此而已。和崔道怡老师、张守仁老师对比，他们就像精神的引领者，在他们面前我永远都是在仰望中。

文学的摆渡人走了，在文学写作的大河面前，会有很多人怀念他，他懂得这条河与它的秘密。如今，在往返中，他永远停留在了彼岸，他明白自己的选择和位置。我想，在另一个世界他依旧是文学的摆渡人，一头白发，一袭红衣，站立在天地之间，他是一道风景，是人间永远的定力！



崔道怡

我在贵州毕节惊悉崔道怡老师逝世，不胜哀痛！

《人民文学》杂志社发信告称，崔道怡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文学编辑家、评论家。他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17日14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崔道怡老师1956年夏天毕业于北京大学，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从一名普通编辑到常务副主编，直至1998年冬天退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了42年。

崔道怡老师虽然没有编辑过我一篇文学作品，但在我心中是由衷地以崔道怡先生为老师的。崔道怡老师退休后以另一种方式辅导和支持青年们的文学创作。崔老师首次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是2000年，那一年他66岁，研讨的作品是长篇报告文学《智慧风暴》。我看到崔道怡老师写出评论文章，在研讨会上满腔热情地朗读出来，我深受感动！那时我想，或许是崔老师毕生从事编辑的严谨，对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有近乎神圣的崇敬，老师在要求自己写出的文学评论可阅可诵吧！崔老师还参加了我的《中国新闻教育》《贫穷致富与执政》《农民》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研讨会。他对我作品的评论一次次更深入更充分，不仅条分缕析地评论作品的内容，还指出我的作品将文学、历史、哲学、科技、经济、教育等多学科融为一炉，这是在文学表现形式上的创新。老师还指出我的创作是一种面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性写作，并有很强的前瞻性。这样的评论对作者的支持是多么大呀！

崔道怡老师每一次参加研讨会都穿着红色上衣，每一次都写出评论，每一次都在研讨会上铿锵

# 深切悼念崔道怡老师

□王吉甲

地朗读出来。在当代文学评论家中，满头白发的崔道怡老师的评论及其发表方式，是独特的。

崔道怡老师最后一次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是2019年5月参加《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研讨会。这年他85岁，一如既往地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的评论，标题是《文学的“天眼”》。他的文章发表在当年6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他评论道：“这一部书，有人物、有事件、有情感、有理智、有细节、有论述，写得条理清晰，眉清目秀，起承转合，心旷神怡。对于一般作家来说，写这样的人和事，且不谈他愿意不愿意，即便是愿意，写起来又谈何容易？这是费时费力，却未必有名有利的苦差事，这是在真实的框架中既有文学的情怀，又要有科学认知的创造。”

这是崔道怡老师最后一次对我的作品作出评论，他把理性的评论写得如此充满感情，似乎要把“满满的”肯定，全部毫无保留地给我。我知道崔老师对我作品的肯定，凝聚着他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工作以来的经历与情怀。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文学期刊称《人民文学》呢？1956年，我国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民而写作，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写作，为选出编辑出为人民

而写作的好作品而工作，这是崔道怡一生为之自豪的事业，也是他为之勤勉工作一生的追求与奋斗。我知道崔老师对我作品的肯定，首先是基于我作品中的情感和立场。

2021年春，我最新的报告文学作品《走向乡村振兴》出版。在写作中我曾犹豫某些内容写还是不写，踌躇后写了，并在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还应该写下，多年来我所尊敬的前辈老师们对文学所应该担当的社会与人文职责的教导，他们的忠诚、职守和品格所给予我的教育，还在我心中，促使我去做我应该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会体会到了传承的力量。”那时，我就是想到了崔道怡等一批前辈老师多年来对我的教诲、支持和期望。

我还记得，我去采访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时，曾经为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从四川打电话到北京与崔道怡老师商量，最后题目确定为《在废墟上看见日出》，全文发表在《中国教育报》整版。如今，崔老师走了。《人民文学》杂志社发的讣告称：“遵照崔道怡同志遗愿，遗体已于2022年7月19日完成捐献，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由此我们知道，崔道怡老师是一个把自己奉献得很彻底的人。

我再也听不到崔道怡老师那富有经验和智慧的意见了。但是，崔老师留给我的教诲、情怀、勉励和期望，将永远与我的生命同在。我也会像老师那样去帮助年轻的作品，这也应该是一种传承吧。



□甘建华

到大同街家中包饺子。走在路上的时候，王洛宾告诉我，《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民歌，哈萨克人叫作《羊群儿躺着想念你的人》。1939年7月，著名导演郑君里来青海拍摄大型抗战纪录片《民族万岁》，外景地选在金银滩草原。王洛宾受邀扮演影片中的藏族男青年，草原部落头人的女儿卓玛扮演牧羊姑娘，拍戏过程中，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有一次两人独处时，卓玛察觉到了王洛宾灼热的眼神，便用牧鞭轻轻地打了他一鞭子，反而令王洛宾彻底爱上了她。“第四段唱词‘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多年来被人改为‘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说一句笑话，这选择细细的皮鞭的想法是多余的。如果你能抛弃一切跟她去放羊，那鞭子的粗细已不是考虑的问题。”

王洛宾毕生创作了千余首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其传唱最广的歌曲，也是华人歌曲在世界传唱最广者之一。他曾希望自己编写的民歌能够传唱500年，如今看来只要人类存在，这首歌就会继续流下去。因为它不仅充满了青春浪漫情怀，而且内容健康，艺术高超，具备为世人传颂的各种要素，因而成了一首跨越地域、语言、种族和时代的经典之作。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是第一个演唱这首歌的外国人，时在1947年上海庆祝法西斯胜利及联合国成立演唱会上。后来又由前苏联男高音歌唱家伊布托夫的中国巡演，以及美国爵士女歌手戴安娜·罗斯、世界三大男高音其中两位普拉西多·多明戈、何塞·卡雷拉斯的多地巡演。台湾著名女作家、旅行家三毛是王洛宾的铁杆粉丝，曾将这首歌唱唱到了西班牙和撒哈拉沙漠，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将它编入了东方音乐课程教材。

王洛宾曾经对外宣称，这首歌融合了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儿躺着想念你的人》、维吾尔族歌曲《牧羊人之歌》的精华。就在这首歌问世不久，歌唱家赵启海从重庆来到西宁，王洛宾陪同他四处游玩，临时时交给她几首新疆民歌，并把最初曲名《草原情歌》更名《在那遥远的地方》，后来成了费穆执导电影《小城之春》的主题曲。实际上，这首歌在国内有两种唱法，王洛宾说：“这个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原因大约在1945年，青海省政府保送几名大学生，前往重庆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学院教师从一个女生的口中，记下了这支歌曲，并选为声乐教材。殊不知，这位女生的音准极差，“善于”走调，因此有了第二种唱法。王洛宾认为，从曲调

优美、天籁之音的角度看，还是赵启海在重庆首唱最好。

听说青海地方文史专家朱世奎见过王洛宾，我便向这位九秩老先生询问当时的情景。根据他的准确回忆，1988年2月8日上午，西宁地区文艺界的朋友们在省歌舞团二楼会议室举行欢迎王洛宾先生迎春茶话会。时任省社科院院长的朱世奎与省文联主席格桑多杰应邀出席。那天的会议气氛异常活跃，一位年轻的女琴师在会场一角，轻轻地弹奏着王洛宾的西部民歌。随着悠扬动听的琴声，大家的话题逐渐集中到《在那遥远的地方》，都想探究这首神曲的产生过程。掌声响过以后，王洛宾慢慢地说道：“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却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深处。30岁时不敢说，40岁时无话不说，50岁时恐惧说，60岁时不想说，现在我已经70多岁了，也就无所顾忌了。在金银滩和卓玛姑娘拍电影、看电影的日子里，美丽、聪明、多情的卓玛姑娘，不但演戏时非常投入，感情也非常投入。藏族中卓玛是仙女的意思，而她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女神。我被她深深地打动了心扉，虽然语言不通，但爱恋之情是不需要语言的，我也只能把强烈的爱情，深深地埋在心里。卓玛姑娘是圣洁无暇的，我却已经结婚成家，不敢再做非分之想。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几天后，那种依依惜别之情，真是让人痛不欲生。我在返回西宁的路上，一步三回头，三步九回首，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其时哈萨克民歌旋律在耳畔响起，卓玛姑娘美丽的形象在心中升起，她的形象和音乐旋律水乳交融地溶解在一起，《在那遥远的地方》就这样诞生了。”

我在古城西宁求学时，也曾见过藏族诗人格桑多杰，他从果洛州委书记任上调到省文联后，当选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五届委员。《仓央嘉措》作者、曾任甘肃省作协主席的高平曾经这样说过：“在新中国的第一代诗人中，我认为藏族有四大诗人，他们是丹真贡布、伊丹才让、饶阶巴桑和格桑多杰。”“当代藏族热烈、真诚、明朗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旗帜，能够在手中更高地举起的，只有格桑多杰了。”（《西部诗报》2009年6月10日总第2期）我前年撰写纪念诗人邵燕祥的文字时想到他，他在《青海日报》副刊见到后，特地叫女儿联系我致以谢忱。他的回忆与上述各人又有所不同，据他说：那一年7月，王洛宾带着简单的行李，从西宁出发，沿着大通河，翻越达坂山，来到祁连山脚下的金银滩草原，住在达吾玉部落（也叫达玉部落）千户长同曲乎家。他的三个姑娘个个

长得健美秀丽，小姑娘卓玛尤其美丽善良，温柔热情。卓玛每天为王洛宾烧奶茶，拌糌粑，他也主动陪卓玛外出放牧，一起聊天，一起在月光下唱歌。当时他们带了一台放映机，在大草原上放映了一部无声电影。他和卓玛一同坐在马鞍子上观看，并向卓玛讲述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在彼此频繁的交往中，他的情感开始冲动，慢慢地心中爱上了卓玛，卓玛也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向他传递爱慕之情。过不多久，剧组离开草原，告别卓玛一家。然而，与卓玛姑娘的情感交流，却深深地印在民歌王子的我心里，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深情地怀念金银滩草原。听了王洛宾讲述这段感人的故事，格桑多杰非常激动，当即写了一首《伊呀阿热罗》：“心中有一片牧场/春里花香/秋里牧歌/你是哪方的草原/你是哪方的姑娘/岁月在为你歌唱/寻找春燕的故乡——伊呀阿热罗/心中有一位美丽的卓玛/朝云间放牧/月光下吟唱/你是哪方的草原/你是哪方的姑娘/岁月把你珍藏/——伊呀阿热罗”。后来，这首歌词由王洛宾谱曲，收在新的歌曲专辑里。

又承青海诗人、《金银滩文学》季刊主编原上草（赵元文）相告，《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好姑娘真有其人，全名萨耶卓玛，“萨耶”在藏语中是“保佑”的意思。她生于1922年，9岁时作为养女，随同嫁给同曲乎千户长做二房的姨妈才塔，从贵德县如玉村娘家来到金银滩。郑君里带着剧组来到达吾玉部落，同曲乎为剧组举行欢迎晚宴，同年17岁的萨耶卓玛被选为演员，与26岁的男主角王洛宾扮演恋人。嗣后，王洛宾曾从西宁到金银滩草原采风，搜集整理民歌曲调，最初依然住在同曲乎家里。这次采风历时三个多月之久，两人的感情有多深多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当然还有卓玛的家人知道。

原上草说：“当年我采访过同曲乎的小女儿才让卓玛，还有才塔的女儿。她们回忆萨耶卓玛与王洛宾时说，家人要管制住萨耶卓玛，不让她到处乱跑，但她性格非常刚烈，从千户大牲口棚爬上房顶，跳到野外草地上，一定要去找王洛宾。他们住在青海湖畔同曲山山下同曲乎大老婆婆洛的帐篷，两人在草原上放牧，转遍了青海湖周围的山水。才让卓玛还说过，萨耶卓玛与王（洛宾）先生相识后，觉得王先生很有文化，促使她一门心思想要嫁给汉人。尽管有头有脸的牧区大户人家上门提亲，但都被萨耶卓玛坚决拒绝了。”

1944年，萨耶卓玛嫁给民国时期海晏县第七任县长史炳章。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不幸夭折，大儿子尼玛多杰今年76岁，现居刚察县牧业乡村，他的孙子在县直机关工作。1954年，萨耶卓玛病故，享年32岁。金银滩草原有她的两尊铜像，一尊是手执鞭策马奔驰，基座上镌刻着“在那遥远的地方”七个镏金大字；一尊是她与三只羊的立像，基座正面刻着“金银滩”三个大字，下面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开头部分的词曲。原上草发来一张萨耶卓玛的照片，果然与我想象的差不多，典型的青海藏族女性形象，长条形脸蛋，眼睛大而神，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据说是她29岁那年拍的，也是留在人世间的唯一的照片，与电影《民族万岁》中的模样略有变化。